

经济文摘

Digest

全球 500 强 大公司的俱乐部

2005 年《财富》全球 500 强榜单近日出炉。今年的榜单和往年的一样：都是世界级的超大型公司的俱乐部。但似乎又有些不一样：今年“全球 500 强”的争夺战异常激烈，想跻身其中简直是难上加难。最后一个进入幸运之门的第 500 名企业，其总收入水平比历年的纪录高出 15%，即 124 亿美元。

对于《财富》全球 500 强公司的整体来说，过去的 2004 年真是个好年头：它们的收入上升了 13%，利润提高了 27%。“去年真是赚钱的好年份，尤其是对于欧洲和亚洲来说。”花旗 Smith Barney 公司全球资产战略专家 Ajay Kapur 也忍不住这样说。

大公司一顺百顺？

虽然 500 强是大公司的俱乐部，但是去年的榜单似乎在暗示我们：做大有时是一件好坏参半的事。对于大型石油企业，做大在去年意味着赚大钱；但对于其他一些企业，做大却让它们大大地头疼了一番。

在石油领域，由于原油价格每桶上涨了 50 美元，各大公司都“坐收高利”。英国石油公司的进账增加了 23%，达到 2851 亿美元，与沃尔玛的差距缩小至 30 亿美元以内。“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不是吗？”——公司的首



席执行官乔治·布朗毫不掩饰自己的兴奋。

不过，即使是英国石油公司这个利润额增长了 50%的“幸运儿”，也要在稳坐利润排行榜第一把交椅的埃克森美孚公司面前收敛一下笑容，毕竟，后者增加 253 亿美元利润刷新了“500 强”纪录。此外，其它几家石油大鳄的成绩同样令人刮目：英荷皇家壳牌石油公司和美国雪佛龙就分别交出了 33%和 29%的收入增长答卷。

一些亚欧的大公司同样业绩颇佳。仅以汽车制造领域为例，德国戴姆勒·克莱斯勒公司(第六位)和日本丰田公司(第七位)在今年的“500 强”竞赛中击败了福特，使得这家美国汽车巨头不得不屈居第八。戴姆勒·克莱斯

勒的利润增加了六倍达到 31 亿美元，丰田公司赚了 109 亿美元，这比通用、福特和戴姆勒·克莱斯勒的总和还要多。尼桑(29 位)也取得了自己标志性的一年，赚了 48 亿美元，这样良好的业绩，也使得它的 CEO 卡洛斯·戈恩同时成为了拥有 45%日本汽车制造商的法国雷诺汽车公司(第 80 位)的总裁。这使戈恩成为历史上同时兼任两大“500 强”公司总裁的第一人。“我简直满钵盈了！”他 3 月时这样对《财富》说。今年，中国的“全球 500 强”企业由去年的 15 个增加到了 16 个。

“公司做大意味着优势的取得。”一些持积极态度的业内人士指出，“只有大公司有能力承接高额或高风险的项目，因为他们有广阔的回旋空间。”一位“500 强”公司的总裁更是踌躇满志地表示：“公司的发展没有极限，只要拥有明确的目标、缜密的计划和优秀的团队，前进的动力就将源源不断。”

另一方面，成为“全球 500 强”除却荣耀与光鲜，也有相伴而生的“烦恼重重”。蝉联榜首达四年之久的沃尔玛成为众矢之的已是不争的事实；前十名中的通用汽车和福特公司也因沉重的退休金负担而使债券价格在今年春天出现狂跌；不久前，美国国际集团的假账丑闻更使全球商界为之震惊，现年 80 岁的“功臣

级”董事长莫里斯·格林伯格也被迫离职。

英明的掌门人

卡洛斯·戈恩的兼任使人们在探寻大公司基业常青的秘密时，将关注的目光更多地投向了企业的领导人。通过总结不难发现，几乎每一个成功的商业巨头的总部办公室里都有一位高瞻远瞩、英明果敢的总裁在“指点江山”。他们首先为公司设定一个合理而长远的目标，之后建立严密的组织体系将目标贯彻执行，并采取有力措施对这一体系实施管理和控制。

英国石油公司的总裁约翰·布朗始终将“利润和潜力并举”的项目作为投资的首选，并且建立了一套完善的绩效契约制度。该制度以“分工细化和明确”著称，用布朗本人的话说，“这是一套严格的个人责任制，没有两个人会对同一件事负责。”在公司核心竞争力问题上，布朗的态度十分明确：“我们在石油和天然气的开采和加工上有绝对的优势。然而，像许多其他的 500 强企业一样，我们并不是在所有领域都很出色，因此，对于一些部门做出裁减是必然的选择。”

在许多领域都“数一数二”的通用电气拥有一代又一代具有继承和创新精神的掌门人。现任总裁杰夫·伊梅尔特正加速推行新的

■ 经济生活

“的哥”，活得好难！

出租司机，是生活在都市的一个特殊群体，被有些人称为“当代祥子”。这个高风险、压力大、超负荷工作群体的生存状况又是怎样的呢？

份、份、份，这紧箍咒太紧！

张师傅：我每天天一醒，还没睁眼呢，第一个念头就是今天欠人家 200 块钱呢。这份钱简直就是一道紧箍咒。6 月 9 号是我 50 岁生日，早上，我本想今天不出车了，人一辈子能有几个 50 岁？再说亲戚们还来给我过生日呢。到了 10 点多，我觉得不行，在家里呆不住，一天的份钱拉不出来，以后几天就更忙活，嗨，没辙，还得出车！现在份钱这么高，活难拉，油钱还噌噌地往上涨，我这心每天就跟压块石头似的，哪天都得干 16 个小时以上。顺利的话，一月能挣 1500 到 2000 块钱，要是不顺利，车出点毛病什么的，一个月可就白干了。

我干了 10 年出租，落下一身的病。心脏不好，透透救心丸得随时备着，颈椎、脖子、腰，哪儿都疼，但天天还得玩命跑。一个月苦熬下来，交份钱的时候，一大把都给了人家，数一数，没剩下几张是给自己的。

林师傅：您看我到现在(晚上 8 点)还没有吃上饭呢，到 10 点以后回家才能吃。我总觉得自己会累死的。我曾经有一回也是一天没吃饭，晕了。拉两个女孩子回家。她们上车后，我就说跟您二位商量商量，我去买两个烧饼成不成，我都一天没吃饭了，就等我两分钟就成。俩女孩好心，答应了。我买了，三口两口咽下去，缓了一会儿，没事儿了。

(**记者调查：**据了解，北京市在出租公司工作的司机每月平均要交 4800 元左右的份钱，再加上燃油费等各项费用，合计每月支出 7000 多元。重压之下，许多出租车司机除了睡觉之外，所有时间都在马路上捱活，月收入才能基本保持在 1000 到 2000 元之间，低于北京市的平均工资水平。)

谁不疲劳驾驶？谁不带病出车？

戴师傅：您瞧，路边的警示牌上有这么一句话：“请勿疲劳驾驶”。这话说得通，可往住行不通。这么多出租车司机，哪有不疲劳驾驶的？不疲劳驾驶，能挣出钱来吗？我自己有时累得开着车就像在做梦，你看我睁着眼呢，其实脑子里一片空白。有一回前面的车停了，我明明看见了，可还撞上了。有一回，一个乘客问我上什么班，我说白班。他说：“你这班我还放心点，昨天打了一个车，上车后我睡着了”。一觉醒来，发现司机不知什么时候也睡着了，车就停在一座桥上，吓死我了。”其实，我们也知道疲劳驾驶对自己、对乘客都不安全，可不玩命地跑，这份钱挣不出来啊。

陈师傅：这个行当就是吃老本，等身体歇得不行了，就被自然淘汰了。有病也不敢去检查，花钱不说，工夫赔不起。我前列腺有毛病，就是自己拿点药吃。这病就是开出租得上的。

以上文章摘自：
《经济参考报》、《半月谈》、《中华工商时报》、《国际先驱导报》、《中国青年报》、《中国经营报》

■ 财富人物

单祥双 喜欢造梦的人

单祥双说自己是喜欢造梦的人，同时也是一个非常务实的人，因为他基本上都能把这些梦变成现实。他常说：把不可能的事情变成可能才能够实现人生的价值。

1991 年，24 岁的他成功地从教育系统调到了交通系统，并成为当时该系统最年轻的一名副处长。几乎让所有相识的人都认定了他今后的仕途前景。7 年之后也就是 1998 年，单祥双 31 岁，在仕途一片辉煌的时候，他却决定，辞去公职，南下深圳。去深圳的时候，是炎热的夏天，单祥双被安排到莲花山安置区里面。“那个安置区啊，是来到特区的一些打工仔，还有一些无业游民集散的地方。脏乱差是非常明显的现象。我就感觉到自己呢，仿佛又回到童年一样，又回到那么一个困顿的环境里边。”

那段时间单祥双白天上班，晚上回来一个人爬山。莲花山并不高，回来经常一个人连续爬了五次莲花山，一方面是锻炼身体，另一方面也排解心中的压力。

初到深圳的单祥双供职于招商银行下面的一个证券公司。虽然拿着一份还算优厚的薪酬，但是天生不安于现状的他还是处处在寻找实现梦想的时机。而深圳的开放和自由又给满怀激情的单祥双提供了无限的想象和行动的空间。1999 年，单祥双发现，在交通投资领域里边，存在着很大的问题。有的人有钱找不着项目，有的人有项目又找不着钱，项目和资金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信息不对称。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不对称呢？他经过数月研究，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希望组建一个中国交通投融资委员会，将交通部、铁道部、民航总局、信息产业部、管道局，和五部委当时所属的大型企业集团上市公司整合在一起，构建起一个为项目融通资金，为资金嫁接项目的投融资的平台。

方案提出的时候，受到了很多人的质疑甚至是嘲笑。大家觉得这不现实，同时把金诚企业、银行、证券、基金都掌握到里边来。有人说这个应该是国务院总理做的。

对于议论，单祥双并不在意，只是想闷头做自己的事情。他坚定地觉得这个事情是可以做成的。“我坚定一个理念，这个世界我们可以做成很多事情的。如果没有做成是

■ 专家论坛



因为没有找到做成这件事情的渠道和方法。君子性非异也，善假于物也。”

单祥双就在这份理念的支持下，开始建造他在深圳的第一个金字塔。他通过以前的同事，找到了原来担任交通部部长的钱永昌。在他的推荐下，又找到了原招商银行第一任行长王世桢。最终在他们的撮合之下，这个项目从提出到设立，前后仅仅用了 3 个月的时间。之后，32 岁的单祥双出任该委员会秘书长。

许多人都很奇怪，单祥双找到钱部长时，和他实际上是不熟悉的，那么单祥双是怎样让他来认同自己的呢？

“男人的真诚和女人的泪水是同样不可抗拒的。我相信真诚，男人只要真诚能够打动所有人，而且能够赢得那些真诚地人对你的支持。你真诚的告诉对方你能做什么，你想做什么，做这件事情需要对方给予什么样的支持和帮助。因为当时我提出组建中国交通投融资专业委员会这个设想的时候，正是当时的钱部长在思考的问题：怎么样来推动交通投融资市场的发展。”

单祥双恰恰把钱部长所想的东西给了他。

“他想的事情还没有着手实现。因为不知道怎么实现的时候，我给他送上去这套方案了。他就觉得正是时候，这确实是一件好事。我所策划的任何一件事情，基本上都是别人

绩效考核制度，在新的制度中，奖金将与创新性的建议和顾客满意度直接挂钩；前任总裁杰克·韦尔奇在担任通用电气 CEO 的近 20 年中，领导 GE 完成了 993 次兼并，GE 市值从 130 亿美元一路升至最高时的 5600 亿美元，并连续九年保持增长超过 10%的纪录，从而成为全球最受推崇、最富竞争力和市场价值最高的公司；韦尔奇的前任——雷金纳德·琼斯也因其独创的金融管理模式而受到商界的普遍尊敬和认同。

对于沃尔玛而言，单纯的低价策略早已因时间的流逝和市场的磨洗而褪色，先进的科技日益成为公司业绩节节攀升的不竭动力。沃尔玛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数据库系统，相关工作人员在指挥部内就可全程监管公司全球零售的模式和进程。通过分析过去两年里飓风及暴风雪来临时期的产品销售状况，沃尔玛了解到，一些平日的低需求商品如开罐器等反而变得紧俏，因此管理人员针对特殊时期制定了相应的进货及销售策略，效果显著。沃尔玛的首席信息员琳达·迪曼兴奋地说：“公司的技术不仅为我们及供货商提供了丰富而详实的数据，而且为彼此的沟通与合作搭建了一个全新的平台——不论身在何处，‘符号’永远相通。”(文/钱玥 苗倩倩)

物权法能承载多少期待

《物权法》审议稿的每一次修订，都会引起舆论的热烈关注。法律尚未通过，成效已经出来。

《物权法》其实是一部技术性很强，也相对较抽象的法律。也许人们有太多急迫的要求了，总赋予或者希望《物权法》能解决更多具体的问题。于是在关于《物权法》的一些争论中，理论诉求与现实诉求构成了一种立法的矛盾。一方面法学家和立法者们希望弄出一部能管一百年甚至更久的抽象的物权体系，另一方面民众却有着更多具体的事情希望《物权法》能够涉及。

这些想法都有很大的合理性，使立法者和民法学者们必须迁就妥协。譬如小区的绿地，车库该归谁所有，居民能否在农村购买宅基地，甚至国有企业、集体企业领导人导致资产流失怎么办，征地、拆迁补偿不到位又怎么办等。《物权法》对此可以照单全收，但却可能因此伤害《物权法》的稳定性和理论体系的完整。

虽然《物权法》对保护私有财产权的确有深远意义，也是我们缺乏的，但它的意义仍然被夸大了。这种夸大含有一种危险的暗示，一个遥远的例子就是罗马法。学者们对《物权法》乃至民法典的制定，背后都怀着一种仰慕罗马法的情结。但罗马法后来的悲剧恰恰来自这种对私法的过分夸大。

对国家权力而言，私法仅仅是一个被容许的事实，而不是一个针对权力的戒条。如果市民社会是一块草坪，那么《物权法》回答的是能否种草，怎样种草，草坪可以发展到多大。但惟有公法才能成为草坪周围的栏杆。没有私法，不能发展出成熟的草坪。但只有私法没有宪法如罗马帝国，草坪仍然可能被任意践踏。

只有《宪法》和《行政法》才构成针对权力的戒条，才能为私法内的自由举行成年仪式，真正防止我们的财产权被侵犯。但这恰恰是当初罗马帝国所缺乏的。当不受限制的皇权日益膨胀，一度辉煌的罗马私法很快便被吞没，罗马也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那种过分强调靠《民法》的发展，靠《物权法》等私法的成熟就可以保障产权和契约自由的法律实证主义观点，其实是幼稚的。

财产权和契约自由一样，不可能独自存活于私法内部。人类法治进步的历史，就是以公法保卫私法的历史。这也是英美法系不对公法和私法作刻意区分的缘故。只有当权力被有效制衡，被法律捆绑，只有当财产权和契约的概念从私法进入公法，从物权走向人权，成为凌驾于国家权力之先的一个初始来源，一个自由的、生生不息的私人财产的空间才可能如鱼入大海，鸢飞蓝天。

买不起经济适用房商品房？

近日，北京市发改委预测北京房价下半年还会“稳定上涨”。发改委的官员分析道，一方面，北京房市目前可保持每年 2000 万平方米以上的供应规模；另一方面，北京经济适用房排队等现象就说明了需求旺盛问题，“充足的供应”和“旺盛的需求”说明房价稳定上涨是很自然的。”

全国的房价依然上涨，而人们有关房市的关注热度普遍降温，大家似乎已经开始接受现实。然而，政府相关部门时不时冒出些莫名其妙言论，把望房兴叹的普通百姓气得半死。北京市发改委的房市“供需两旺”论就是一例。

西晋惠帝年间，天下大灾发生了饥荒，百姓没有粮食吃，只有挖草根、食观音土，许多百姓活活饿死。十万火急的灾情报至皇宫，高坐在龙椅上的晋惠帝经过冥思苦想，却悟出了一个惊人的“解决方案”——“百姓无粟米充饥，何不食肉糜？”

今天，房市“供需两旺”论中恰恰蕴涵了与 1700 年前晋惠帝“不食肉糜”论并由同工的荒唐逻辑。发改委的官员说房市供给充足，但忽视了“两头小、中间大”的供给结构，真正“供给充足”的是均价超过 6000 元/平方米的商品住宅；发改委的官员说需求旺盛，同样忽视了需求结构，经济适用房放号前排起的长长队伍是证明了需求旺盛，但这种需求不是对普通商品住宅的需求，而是对低价、小户型经济适用住宅的需求。在这种错位的“供需两旺”情境下，要实现价格“稳定上涨”，就意味着让在经济适用房前排队等号的消费者去买均价 6000 元/平方米的普通商品住宅。发改委官员们的潜台词正是：中低收入者无经济适用房可住，何不住商品房？

以维护宏观经济稳定为己任的政府有关部门应该对“粮食”“肉糜”供给失调的房市保持警惕，对广大中低收入者的真实需求保持清醒认识。政府有关部门理应致力于改善房市的供给结构，扩大经济适用住宅的供给量，满足广大中低收入者的口粮需求。而视“粮食”“肉糜”供给失调的局面为正常或健康状态，让吃不起“粮食”的百姓去买“肉糜”，这不仅代表着决策者的愚蠢，还意味着政府的失职。(文/钟大军)